

黄炎培与毛泽东『窑洞对』前后

□ 薛永毅

1945年7月1日至5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6人赴延安访问。返回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所见所感形成书稿《延安归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记载了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窑洞对”成为党史国史上的著名典故。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国共两党剑拔弩张，这也让黄炎培等民主爱国人士忧心忡忡。出于良心和责任心驱使，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于次日由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左舜生、章伯钧七人联名发出。这份电稿的大概内容是：鉴于目前局势，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商谈国内团结问题，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6月18日，也就是在中共七大胜利闭幕不到一周，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黄炎培等，称：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我党无不乐于商谈，并表示热烈欢迎黄炎培等七位参政员来延安共商国是。

临行时，黄炎培发表谈话：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7月1日上午，访问团除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外，黄炎培等其他6位参政员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

边地风光迥不同

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抵达后，延安的接待工作规格极高。毛

泽东不仅带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谢觉哉等数十人到机场迎接，中共中央还于7月2日晚在杨家岭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欢迎晚会。

在延安这5日，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随便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此外，他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时、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

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一个宿愿。而短短数日，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和勃勃生机。给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块荒废了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较好。黄炎培还发现，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时，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一般并不连称他的头衔。而这里的军民关系也很好，确是鱼水关系。他坦言，延安5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理想相当近的。

与毛泽东窑洞对谈

黄炎培关于如何打破“民族兴亡周期律”的思考，是由来已久的。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他在成都作“中华复兴讲座”十讲，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提出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其中第六讲便是关于“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而抉破之”的演讲。在黄炎培看来，一个国家要想变强大，一方面靠全国人民的勤俭和努力生产；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怕牺牲。同年8月2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将“抉破此民族兴亡周期律之不二法门”，进一步归结为“自强不息”。

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坦陈多年来心中的远虑。他引用《左传》《礼记·中庸》等典章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甚至“求荣取辱”都有，总之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如何能跳出这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对于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思，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之为信服。他表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延安归来》出版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有很多人不断问他延安的情形。在他看来，无论是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家国大义，都有必要把在延安的经历如实报告给大家。于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很快就于7月24日脱稿，《延安五日记》也完成三分之二。此两篇连同访问期间所作的诗两首，取名《延安归来》。

《延安归来》以一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视角，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对于国民党多年来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无疑是个有力的揭破。书稿写毕，很多朋友劝说黄炎培，“这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黄炎培不为所动，决意出版并愿意承担可能发生的后果。考虑如果把书稿送国民党当局审查，很可能被扣押。于是，他果断决定直接交由重庆国讯书店付印。这在当时重庆是头一遭打破出版前交付当局审查的规矩。就这样，这本32开74页的小册子，只用了8天时间，就于1945年8月初出版发行了。

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国讯》等报刊及时跟进宣传，发布新书广告或予以连载。《新华日报》称该书“凡关心民主团结的人士值得一读”。《延安归来》遭查禁后，又于1945年10月由上海国讯书店再版发行，并被大连大众书店、辽北出版社、东北书店等多家出版单位翻印。随着《延安归来》的广泛流传，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给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展示了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风貌。

震撼了国民党在浙南的反动统治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纪念碑碑文敬读

□ 潘 敏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以下简称红十三军）纪念碑位于浙江省永嘉县浙南红军小镇军部旧址南侧约80米的山岗上，始建于1986年。纪念碑高19.3米，寓意红十三军1930年正式组建。纪念碑正面顶部浮雕的红色五角星下镌刻着张爱萍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纪念碑”。纪念碑底部是基座，基座上刻有碑文如下：

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浙南农民武装暴动连年迭起。一九三零年五月，在中央军委直接部署下，由三十二支浙南红军游击队，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下辖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后改团为师）。是当时正式序列的全国十四支红军队伍之一。鼎盛时期人数六千左右。军部设在农民暴动中心区域之一的五尺村。

红十三军活动范围遍及浙江省南部的永嘉、温岭、永康、缙云、青田、仙居等二十多个县。他们取枫林、打平阳、战缙云、袭瓯渠、攻壶镇、战乌岩、夺茶头，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百余次，震撼了国民党在浙南的反动统治基础。在斗争中，金贯真、陈文杰等主要领导人先后英勇就义，军长胡公冕不幸被捕。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被内“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十三军受挫失败。但是，他那悲壮的战斗历程，为中国革命和后来浙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作出应有的贡献。

苍山不老，楠水长流。红十三军的光辉业绩永垂史册，革命先烈的献身精神，千古留芳。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重修军部旧址，并建碑志铭。

永嘉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

碑文语言精练、行文简朴，真实客观地记述了红十三军艰苦奋斗的光辉事迹和浴血奋战的悲壮历程，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红十三军高举革命红旗，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团结奋斗的历史画卷，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革命先烈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和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读来令人敬佩、催人奋进。

创建成立红十三军

中共中央对浙南地区农民武装斗争极为重视。1929年下半年，浙南红军游击队、浙南苏维埃政权及永嘉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1930年1月，中共中央派金贯真深入温州等地巡视。2月28日，金贯真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温州地区政治形势、群众斗争、武装暴动、党和工农群众组织等内容的报告。3月初，受周恩来派遣，胡公冕到达浙南，成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也就是红十三军的前身。

1930年5月3日，金贯真、胡公冕、雷高升等在永嘉五尺村商议建立红十三军军部问题，同时决定将各县红军游击队集中到永嘉枫林整训。5月9日，胡公冕集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兵分三路向枫林进发，攻下枫林后，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作大纲规定的红十三军番号和指示精神，温州、台州、处州（丽水）三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在枫林整编，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并成立红十三军军部，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红十三军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创建的，是列入中央军委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工农红军之一。红十三军的创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浙江农民暴动最重要的成果。

沉重打击反动势力

红十三军创建后，以永嘉、温岭、永康等地游击武装为基础，先后建立3个团（师）。1930年5月，红一团和红十三军军部同时成立，最初由永嘉西楠溪30多支红军游击队整编而成。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就红十三军的组建等问题发来指示：“中央决定你们成立第十三军的基础，将现有的三团扩充为三师的前途。”7月，以台州地区的温岭坞根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二团，以永康、缙云、仙居等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三团。

红十三军以浙江永嘉为战斗区域中心，活动在括苍山麓、东海之滨、瓯海两岸，他们取枫林、打平阳、战缙云、袭瓯渠、攻壶镇、战乌岩、夺茶头等，横跨温州、台州、丽水、金华4个地区20余个县，前后坚持战斗历时11年，经历大大小小战斗100余场。红十三军英勇奋战、浴血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核心区反动统治势力，一定程度上牵制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兵力，有力策应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在浙南革命斗争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血染浙南

红十三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由浙江子弟兵组成的红军，队伍最盛时拥有6300多人，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当时党内“左”倾错误影响，在斗争中遭受挫折。1930年5月20日，政委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张作霖、段祺瑞看待。

那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搞联合应该以谁为主呢？高君宇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就“较资产阶级为强壮”。由此，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在同资产阶级联合进行革命的同时，高君宇并没有忽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和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问题，他指出，无论何时，无产阶级都要独立的组织起来，不能因为联合而放松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向导》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军阀混战是中国“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帝国主义“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然而，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建立所谓的“好人政府”，认为不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只要有“好人”进入政府，中国就能得救。高君宇尖锐地指出，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会允许“好人”进入政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日不铲除，即使有个别“好人”能进入政府，也难有所为。1922年9月，“好人”法学博士王宠惠出任国务总理，他上台前曾发表一系列对现实政治不满的文章。可是甫一上台，他就把从前的主张置之脑后，做一些滥发公债、在内阁安插美帝走狗的勾当。高君宇就此发表《王博士上台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以醉心英美为合格》等文章，辛辣地讽刺道，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迁就的努力



金贯真从平阳布置任务后返回温州城时被敌人逮捕，当晚被杀害。斗争中，陈文杰等主要领导人先后英勇就义，军长胡公冕不幸被捕。1932年5月23日，发生“岩头东宗”事件，红十三军主力被严重摧毁，余部继续坚持斗争。

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红十三军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浙南有1700多名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营级以上指战员和中共浙南特委主要领导成员大多殉难，长眠于浙南大地。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监狱里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在刑场上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伟大的革命精神。

为《向导》周报鞠躬尽瘁的高君宇

□ 仲艳妮

高君宇（1896—1925年），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山西省静乐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中共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等职。1922年9月，高君宇与蔡和森等人共同创办了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从创刊到1925年3月因病去世，高君宇以日常编辑和记者的身份，先后发表26篇文章，宣传党的革命主张、阐述有关革命的重大问题，是党早期革命思想理论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是要为了群众利益的呵！”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从建党之日起，高君宇便开始分析革命的动力以及党的作用等重大问题。他认为，中国广大民众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1922年10月，为反抗剥削和压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开滦五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得到社会各界声援和支持。然而国民党《沪报》《民国日报》刊载的文章，却对此事态度含糊、立场暧昧。高君宇一腔义愤，在《向导》第8期发表《国民党报纸不应有这样记载》一文，指出国民党不应该替军阀和外国军队说话，至少应该帮助和鼓励工人。高君宇指出，离开群众的支持，革命不可能成功，“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惟有是团结了的劳动群众”。这一观点十分先进。直到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还在大声疾呼：“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革命依靠群众，革命也是为了群众。1922年10月，高君宇在与张大雷合写的《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

证明是失败的，标榜民主的学者上台“也一样做了军阀的账房”。

高君宇深刻地认识到，要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必须坚决地反帝反封建，这也是他短暂而辉煌革命一生的主基调。1924年夏，在帝国主义唆使下，江浙地区再次爆发军阀混战。高君宇接连发表《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等檄文，怒斥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凶狠残暴。高君宇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团结起来，“把他们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值得注意的是，高君宇认为落后的中国“需要借助于外国的机械和工业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但中国决不能乞求于帝国主义的英美，否则只能使“奴隶地位更深一层”。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标联系起来，反帝却不盲目排外，这是难能可贵的。

《向导》在创办过程中历经艰难险阻，高君宇为其发展壮大而倾尽全力：运行经费缺乏，他便拿出自己大半生活费予以保障而节衣缩食；为躲避敌特监视，他不得不频繁搬迁编辑部，并以承揽市民活计为掩护；为扩大发行渠道，他在全国各地联络分售处。在高君宇等人的努力下，《向导》被打造成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和舆论宣传主战场，它像锐利的匕首刺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像嘹亮的号角鼓舞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被广大读者和革命青年誉为民众政治生活的“寒暑表”、四万万苦难同胞的“先锋队”，成为党的历史上党报党刊的光辉典范。

